

多民族地区： 资源、贫困与发展



主编 潘乃谷 周星

族地区如何才能够迅速地走上一条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认为应该特别重视边区的乡镇企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在面临资源开发和工业化的选择时,我们主张应该特别强调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充分兼顾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包括少数民族的利益。我们相信,在搞活边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努力中,也是有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在关注多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时,我们还十分留意政府机关在职能转换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特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龚佩华教授所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教育通常被认为可以对受教育者在生存和发展上有所帮助,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在教育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而且,在我国多民族地区,教育本身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类似海南三亚市那样迅速发展的地方,少数民族问题的前景如何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对应,这些想必也都是广大读者所共同关心的。

不言而喻,本课题中的各项研究,当然也都有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之处,对此我们理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也希望得到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编 者

1995. 3. 31

8.751E
81

主编 潘乃谷 周 星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费孝通	
封面设计	潘小庆	济 森
责任编辑	余 秀	

编者说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1985年和1987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一直在他的学术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他一贯倡导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地调查研究入手。他本人身体力行,无论在命题与破题、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学风方面都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路子。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跨出了坚实的一步。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预示着社会的变革进程在加速进行,不断有新的台阶要跨越、新的情况要认识、新的问题要解决,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人类学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

为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作风,也为了交流新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

汇集了自我所承担“七五”国家课题以来的成果，编辑成“社会与发展研究论文集”和“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两套系列出版物。希望能在学科建设和为现代化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热切地希望得到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和各行各业的读者的支持、批评和指导。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导 言

本书是在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指导之下,由潘乃谷研究员牵头主持,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和组织完成的一项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脱贫致富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本项研究课题于1991年7月完成论证,并于1992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批准立项。从1992年至1994年,参加该项课题的研究人员,先后多次分赴内蒙古、甘肃、云南、贵州、湖南、海南等省区,分别深入到我国边远多民族地区的牧业社区、农业社区、乡镇企业以及工矿企业社区,进行了较长期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新鲜的第一手资料。收入本书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根据研究者亲身的实地调查所撰写的,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我国边远的多民族地区涉及资源、贫困和发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思考。

本课题是根据我国多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提出的,也是在完成了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涉及边区的资源、贫困与发展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作更进一步的深入开掘。参与本课题研究的作者,有不少人曾不同程度地参加过“边区开发”的研究工作,列入本课题

的各项具体研究,实际上也有不少是对“边区开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因此,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边区开发论著》(潘乃谷、马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的后续和补充。目前,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的,还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研究。由于我国多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脱贫致富,直接关系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团结进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本课题实际上在“七五”和“八五”的这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之间,形成和发挥着使它们得以相互联系的重要作用。

本课题的各项研究,主要采取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结合的社区研究方法,同时,也有一些研究采取了“区域—民族”相结合的专题研究的方法。从获取基本资料的途径看来,无论采取哪一类研究方法,作者们都试图在深入基层社区的前提下,把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和有关的统计资料加以配合。尽管每一位作者所关心的侧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都特别关注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即人的生活及其环境,我们都真诚地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对那里的人们有所帮助,因此,我们尤其关注那些直接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例如生态、就业、生活方式、土地的经营与收入、贫困问题等等。

在论及我国多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时,我们不是为边区相对富有的资源所陶醉,而是对与资源有关的生态问题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在对边区资源的认识上,我们倾向于更多一些忧患意识。关于贫困问题,我们不仅注意到具体的牧业社区里贫富分化的过程,以及农耕地区因为农业危机所导致的贫困化,还对与贫困相关的文化和教育问题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我国边远的多民

目 录

导言.....	编者(1)
草原资源的利用与牧区社会发展——从一个 社区看体制改革对畜牧业、人口迁移和 劳动力组合形式的影响.....	马 戎 李 鸥(1)
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内蒙锡盟白音锡勒 牧场的研究	麻国庆(31)
牧区的非牧就业——一个牧业社区的人类学 研究	丁元竹(54)
单一产业与牧民生活——关于嵯岗镇的个案 分析	付喜国(76)
牧业社区的贫困化与贫富分化	李建东(95)
临夏州农村的土地经营与收入——对四个汉族 村落的调查.....	刘援朝(115)
农业危机与贫困化——建国以来临夏州农村 经济发展之研究.....	刘援朝(140)
贫困与文化.....	周 星(161)
从松山区乡镇企业发展特点看西部地区乡镇 企业的发展趋势——赤峰市松山区乡镇 企业调查.....	潘乃谷(178)

鲁奎山模式——少数民族地区协调发展的探索

..... 朱赤平 朱净宇(230)

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持续发展:以金昌

为例..... 邱泽奇(266)

新时期民委职能的转变与少数民族脱贫致富..... 龚佩华(281)

贵州苗族地区的教育与发展的初步研究..... 周星(291)

三亚市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 丁元竹(326)

草原资源的利用与牧区社会发展

——从一个社区看体制改革对畜牧业、
人口迁移和劳动力组合形式的影响

马 戎 李 鸥

自八十年代初实行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在公社体制下由集体使用 and 管理的耕地,现在由各个农户实行家庭承包、自主经营,而且土地使用权长期稳定不变。在我国北方各牧业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对牧业生产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草场,实行了家庭承包^①,草场使用权的改变,导致了畜牧业经营方式的改变,促成了牧区劳动力在新形式下的重新组合,并给牧区各类劳动者的收入带来很大影响。

为深入调查我国内蒙古牧区的体制改革对草场使用权、牲畜所有权、牧业管理体制、人口迁移、劳动力组合方式以及对草原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我们于1992年夏天和1993年夏天两次在锡林郭勒盟北部位于中蒙边界的一个典型牧业社区进行了社会调查,希望能通过对一个典型社区的深入剖析来了解牧区体制改革的深度和近年来草原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① 在不同地区,牧场的分配方式和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在一些半农半牧区如赤峰的翁牛特旗,只有打草场被分到户,而放牧场仍然归集体所有,这种模式往往鼓励牧民们竞相扩大自己的牲畜数量以充分利用公共放牧场(马戎,潘乃谷,1993)。而在我们调查的呼尔其格嘎查,则恰恰相反,放牧场完全分到了户,打草场仍保持社区集体所有。

畜牧业是我国“大农业”(包括农、牧、副、渔、林)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草原畜牧业又是畜牧业的主体。我国北方的草原地区,不但是草原畜牧业的载体,也是我国总体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环节^②。

我国草原总面积约为4百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1.7%,占全世界草场面积的13.3%,居世界第二位(曲格平、李金昌,1992:85)。但是由于种种自然和人为因素,草原的退化和沙漠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建国以来,特别是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期间,被开垦的草原总面积估计达2700万公顷,“目前这部分土地有三分之一已经失掉生产力,变成了沙漠”(同上,第88页)。我国北部和西北部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导致了自然资源匮乏,使当地的经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为维持生计而破坏性地利用匮乏的自然资源(砍树、挖草根做燃料,草场过牧),而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植被退化、降雨量减少)又导致减产和贫困。当前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贫困是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恶化分不开的。在非洲一些长期干旱、连饮水也无法解决的地区,成千上万农民迁离家园,这些贫困人口也被称作“生态难民”。

我国的草原资源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如何保护好、利用好这些自然资源,使它不仅造福于当代、也造福于子孙,使生态环境、地区经济和人民的收入能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

① 1992年,我国牧业总产值为245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7%〔《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37页〕。

② 内蒙古草原的植被状况,直接影响华北平原和京津地区的风沙和降雨。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影响内蒙古牧区生态环境资源 利用和经济发展的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面积为 118 万平方公里,草原面积为 90 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重要的草原畜牧业地区之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调查和研究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体制变迁,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全国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在美国国家研究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编辑的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北方草原的书[《Grasslands and Grassland Sciences in Northern China》(1992)]中,我曾撰写了一章详细介绍有关内蒙古草原地区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研究文献,这里不再赘述。根据这些研究文献及作者本人长期在内蒙古草原地区生活的经验,我们认为,在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和牧民生活的变迁当中,人类行为特别是政府政策的影响,远比自然因素如天气、土壤等等的作用要重要得多。下列因素对于理解当地生态、资源使用、牧民生活和收入方面需要特别予以注意:

1. 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内蒙古草原地区的本地居民是蒙古族牧民,他们世代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活动(Jagchid and Hyer, 1979)。由于沙皇俄国军事力量的步步东进,清政府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军事防御,改变过去严格限制汉族农民迁入内蒙古的政策,制定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积极组织草原开垦(Ma, 1987)。从本世纪初开始,汉族农民大量移居内蒙古地区,开垦草原,发展农业。这样,在本世纪的 90 年中,内蒙古自治区的汉族人口从 100 万激增到 1800 万。开垦的农田也增加到

1991 年的 500 万公顷。蒙古族逐步变成了少数民族,草原面积也随着农业的扩展而不断缩小。

2. 政府农业政策的影响。建国后,中国政府长期强调“以粮为纲”。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政府一直鼓励牧民们开垦草原,发展农业,以达到牧区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刘景平、郑广智,1979:185)。这样,即使是北部不宜农耕的纯牧区,在政府的规划下也纷纷开垦草原,建立粮食基地。但由于天气寒冷,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再加上其他种种自然界限制条件,粮食作物不能正常生长和收获,这一尝试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并且由于开垦出的耕地不久就沙化或半沙化,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方面十分严重的后果。

3. 牲畜所有制、草场使用权体制改变的影响。“公社——大队”体制于五十年代后期在草原地区逐步建立。在这一体制下,草场的使用、耕地的开垦以及畜牧业经营管理的都是在政府统一计划下由社队两级来组织进行的(刘景平、郑广智,1979)。八十年代初期的体制改革使草原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社——大队”体制转变为“苏木——嘎查”体制^①,牲畜、牧场和耕地重新分给了牧民。现在,牧场的使用和管理已完全由牧民各户自行安排。在一些地区,由于牧民们只顾眼前利益,仍存在过牧现象,但在牧场和牲畜完全分配给牧民的许多地区,为了保持和提高其草场质量,牧民们已在大规模地开展草场的建设工作^②。

4. 体制改革对迁移模式的影响。随着新体制下各项政策的

① 内蒙古牧区的“苏木——嘎查”体制,相当于农业地区的“乡——村民委员会”体制。

② 根据官方统计,1985 年,东乌珠穆沁旗所围草库仑总面积为 8379.5 亩(合 561.4 公顷)(格尔勒图,1988:264)。

实施,许多在公社体制下移居草原的汉族陆续迁入了城镇。因为在牲畜重新分配中,与当地蒙古族牧民相比,他们往往分到数量很少的牲畜,这样他们既无法继续挣集体工分,又难于以畜牧业为生。与此同时政府新政策却为他们在城镇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允许在服务、商业、手工艺、运输等方面发展私营经济),所以草原上的汉族大多迁往城镇在城里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并致富。人口迁移的这种新模式又改变了社区的经济与人口结构。

5. 体制改革对牧区劳动力组合方式的影响。由于牧区仍然需要许多辅助性专业劳动(打井、打草、盖房、运输等),这些专业性劳动过去是由大队组织本队外来汉族移民去进行的,现在这些离开大队的汉族移民采用市场合同的方式继续给牧民提供服务。这种新形式的劳动力组合是牧区迈向市场经济和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步骤。

6. 畜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改革开放,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大门,畜产品(包括肉类、羊毛、羊绒、皮革等)的价格迅速上涨,牧民的收入也跟着增长。有些牧民为了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利用牧场,就努力增加牲畜的数量,我们在内蒙古中部的赤峰调查时发现这一现象(马戎、潘乃谷,1993)。牧民尽可能增加牲畜数量的原因之一是追求高收入,原因之二是他们担心牧场和牲畜将来有可能会再次被政府收归集体所有。这种短期行为给草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过牧(单位草场面积载畜量过大)、草场不同程度的退化甚至沙化等。

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改变的因果链很清楚:首先,中央政府的政策牢牢地调控着地方一级政府的行政、经济管理体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些体制(如旧的公社体

制和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或影响社区的自然资源(如耕地和草场)使用办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活动;这些最终会对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环境生态系统造成强烈的影响。“政策——管理体制——自然资源利用——经济活动——生态环境”就是中国生态环境变化的因果链条。而生态恶化将部分或全面地导致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破坏和自然资源(土地、草场、林地、水源等)的逐步枯竭,并使得密切依赖于这些自然资源以谋生的农牧民陷于毫无希望的贫困境地。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本文将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对所调查的牧业社区的发展过程展开讨论,它们均与草原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1. 牧区所有制体制的变迁。草原畜牧业的两大生产资料是草场和牲畜,二者密切相关。草场的面积和质量(产草量、草质和水源距离)决定了其载畜量;同时没有相当数量的牲畜,草场也不能充分得到利用。在建国以前,依照草原上的传统牲畜有所有权的问题,草场是社区公用,而且社区之间没有明确的地界,畜群逐水草而居,有时跨越旗(县)地界游牧。1949年以来,政府在这一地区关于所有制和管理体制的政策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改变。政府首先把牧主的家畜分给贫穷的牧民,草场利用方式不变;然后又逐步建立起集体生产组织(先是“互助组”,随后是牧业合作社,最后是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同时划定了以大队为界的畜群放牧范围,草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八十年代初实行农村体制改革,又把牲畜重新分给了牧民,同时根据各户牲畜数量的多少,通过社区成员相互协商的办法,把本大队的草场也分配给各户。这种体制的重大变化对草场的使用办法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而这些不同的草场使用办法

又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并直接影响了草场资源的再生能力。同时体制改革也改变了牧民收入形式(从挣工分到各户独立经营)和收入水平。本次调查主要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四十年来我国北部牧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牧民对这些体制改革的反应是什么?体制改革对人口迁移、草场使用及生态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体制改革对牧民的经济活动和收入有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牧区人口迁移模式的变迁和劳动力的组合形式。1912年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仅为120万,1990年增至1730万。虽然有相当比例的汉族人口增长是由于早期移民的自然增长(生育),但迁移始终是研究内蒙古社会变迁和劳动力变化的重要因素。草原地区的汉族移民和他们在当地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全内蒙古自治区来看,汉族人口的迅速增长(一半通过生育,一半通过迁移)导致了对耕地需要的不断增大和农业向草原地区的扩展。汉族基本上是一个农业文明发源的民族,认为对土地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方式就是耕作农业。由于传统经济活动不同和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本地蒙族牧民和迁来的汉族农民之间会在自然资源(草场)的利用方式上有不同的导向。在纯牧区,少量汉族农民迁来后往往从事畜牧业的辅助性劳动,在公社体制下和在家庭承包制体制下,这些汉族移民与当地牧民之间的劳动力组合分别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人口迁移活动出现了哪些新趋势?这也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从农村流入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民工潮”和从事加工、贸易、劳务的流动人口十分关注,对于农村进入当地乡镇企业的劳动力转移也有不少研究,但对农牧区之间的劳动力迁移及其具体形式的调查还很少。本文试图对一

个社区的调查在这方面进行一下尝试。

这次调查的主题涉及到社会、经济、民族、人口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综合了许多学科的社区发展个案研究。调查中对于上述几个方面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及活动对环境变迁所起的作用。人类社会的组织及其活动有的受历史传统的影响,有的直接与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及其现阶段的改革相联系。我国土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是联系到我国农牧业今后发展的关键问题,政府的政策法规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自然资源的使用管理,调查了解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和各方面的利弊,可以为政府总结、调整有关政策提供参考。同时调查结果也可向更多的人介绍牧区改革的情况,使更多的人关心我国草原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二、调查地点

呼尔其格嘎查(先前的生产大队,本次调查的社区)位于锡林郭勒盟(见图一)东乌珠穆沁旗(相当于县)的沙麦苏木(原来的公社)。它位于中蒙边境,拥有这一地区最好的牧场。它属于巴朗玛格朗波状高原的一部分,土壤为栗钙土和黑栗钙土。总面积为 869 平方公里(合 97363 公顷)。年平均降雨量在 250~300 毫米之间(格尔勒图,1988:17)。1992 年底呼尔其格嘎查注册居民有 91 户,共 516 人。不过,其中有 20 户 109 人既不在嘎查居住,也不从事畜牧业。自 1983 年牲畜重新分配之后,他们便搬入旗所在地(县城)居住,从事于其他经济活动。1993 年夏天我们调查时所有在嘎查居住的均为本地蒙古族。户口登记地点仍在呼尔其格但实际在苏木(乡所在地)或县城居住的居民中,40%